

# 论邹汉勋对地方志舆图绘制的继承与发展\*

颜全已

**提要：**邹汉勋参编或总修的4部名志所记载的区域，明清时多属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所绘制的舆图展示了当时民族地区的状况，为研究当时的地名和山川风貌、民俗人情提供了考察依据；贯穿于其中的舆图绘制原则，是了解明清时舆图绘制继承发展的资料。邹氏将传统舆图“制图六体”“计里画方”“四至八到”“古墨今朱”等绘图原则，同实地测量、多色成图、创造标识符号等方法结合起来绘制新图，其中包含了西方地图的理念，可谓近代舆地学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邹汉勋 方志 舆图 继承 发展

关于地方志舆图研究方面的论述，通过知网检索，近年来产生的成果近百篇，其中学术论文40余篇，学位论文50余篇，可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着眼于宏观层面综合考察论述地方志舆图的发展状况及其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一文，将旧志地图的发展分为先秦至秦汉、六朝后期至唐宋、南宋至清末3个阶段来加以考察分析，认为旧志地图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构成要素方面，即突出表现在以比例尺基本数学要素和地理方位基本要素两个方面。<sup>①</sup> 二是对一部地方志舆图进行具体考察探讨，如《〈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探讨了《钦定热河志》舆图的特征、价值。<sup>②</sup> 三是研究一省地方志舆图绘制情况，如《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对贵州明代4部省志舆图的编绘情况和特点进行分析，说明贵州在明代时期的重要地位<sup>③</sup>；《山西古舆图叙录》对山西舆图现存状况进行考察。<sup>④</sup> 四是重点对明清地方志舆图进行考察研究，如《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主要从思想史角度分析明代舆图的政治功能意向<sup>⑤</sup>；五是对地方志舆图发展趋势的综合考察探讨，如《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势》从方志地图受到关注的程度、方志地图与城市地理空间相结合、方志地图绘制与编纂理论的关系、方志地图与地方社会发展相结合、方志地图研究多学科交叉等方面剖析地方志舆图研究呈现的多元化发展趋势<sup>⑥</sup>；六是结合海防或其他思想观念进行研究，如《方志海图的“越境而书”——以清代〈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为中心的探讨》对寰海岛屿图进行专门探讨，分析该图“越境而书的现象”和“海防一体”及其对旧志舆图范式延续等问题，并对其中的珍贵舆图加以重点介绍和分析说明。<sup>⑦</sup> 综合而言，以上论文均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地方志舆图研究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针对以上研究问题，本文以邹汉勋在贵州参编或纂修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项目编号：16ZDA156）中期成果。

① 参见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

② 参见王颖、杜鹃：《“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参见张英聘：《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1期。

④ 参见袁长江：《山西古舆图叙录》，《晋图学刊》2002年第4期。

⑤ 参见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⑥ 参见潘晟：《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

⑦ 参见何沛东：《方志海图的“越境而书”——以清代〈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3期。

4部名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着重探讨邹氏在继承前代地方志舆图成就基础上，如何绘制和创新舆图的问题。

邹汉勋（1805—1854），清代著名学者，湖南新化罗洪（今属隆回）人，字叔绩，咸丰元年（1851）举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氏博学多才，士林比之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sup>①</sup>；他的舆地学与当时魏源经史学、何绍基书法并称为“湘中三杰”。乡谚赞曰：“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sup>②</sup>他一生著述丰富，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但多毁于战火，后人刊有《邹叔子遗书》7种传世。在贵州游历期间，他受聘删正《贵阳府志》，任《大定府志》《安顺府志》总修，为《兴义府志》协修。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所收的志书中，他参编或总修的就占了4部，对贵州地方志纂修具有显著贡献。《大定府志》和《安顺府志》，尤能体现他的纂修成就，尤以《安顺府志》的舆图最令人称誉。该书纂修于《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大定府志》之后，故能吸收各家之长，成为后来《兴义府志》等志书舆图绘制的典范。对于《安顺府志》舆图，新编《贵州通史》引翁同书的序文作很高评价：“而地之华离者，别之以图，弹丸黑子，表以白书，此又绘图之创格，足以为式者也。”<sup>③</sup>

## 一 贵州明清时期舆图发展对邹汉勋的启示

据《晋书·裴秀传》，西晋之前我国就已出现《古地图》《秦地图》《汉舆地图》《汉括地图》等舆图。作为一个专名，舆图一词最早见于南北朝初期，唐徐坚在《初学记》中谈及后魏时期的《舆图风土记》，始提到“舆图”一词。据史料记载，《地形方丈图》是我国最早用“计里画方”制图法勘绘的地图。至于唐宋以前地方志舆图的基本特征，邱新立进行了高度概括：“早期典型的图经，地图是主体部分，经则是对图幅内容的简要文字说明，如说明道里远近，都邑人口，关隘险要等。有的图经实际上就是一幅地图，而在图幅边缘及空白处作文字说明。”<sup>④</sup>明清时期是地方志编纂最为兴盛的一个历史阶段，全国各地产生不少优秀地方志著作，贵州现存地方志著作也以明清时期最为显著。

### （一）贵州明代的部分省志府志舆图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便以一省面貌见诸全国。此后，地方志书不断产生，直观的舆图即出现在这些志书之中（见表1）。明代贵州省志和府志舆图，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嘉靖《思南府志》、万历《铜仁府志》等，均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舆图绘制之法。这个时期“方志地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绘制方法的进步上，尤其表现在图符图注的设计布局上”<sup>⑤</sup>。因此《贵州图经新志·凡例》以为《大明一统志》的“程式之美，足为万世志法”<sup>⑥</sup>，自《贵州图经新志》以之为圭臬，其后编纂的贵州地方志即相沿继承此法。由表1可知各志书以地理图为主，除省志均有全省总图外，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又添增省城图，各府州卫所均绘有

<sup>①</sup> 尹喜清、刘衍永：《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sup>②</sup> 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

<sup>③</sup> 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卷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sup>④</sup> 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

<sup>⑤</sup> 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

<sup>⑥</sup>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凡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页。

地理图，有的还绘制了城图。万历《贵州通志》还有州卫图、府卫城图。嘉靖《思南府志》、万历《铜仁府志》与省志的舆图有所不同。前者有府儒学图、府境图、府公署图，县城图、司公署图；后者有县地理图、司地理图。正如张英聘所言：“现存明代贵州几部省志一个突出的特点，各志的舆图设置都极其丰富。”“这些图大体仿照《大明一统志》各图，以地理图为主。”<sup>①</sup>

表1 贵州明代部分省志府志舆图表

序号	书名	舆图类型及幅数
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省地理图1幅、省城图1幅、府地理图8幅、州地理图4幅、卫地理图13幅、所地理图2幅
2	嘉靖《贵州通志》	省地理图1幅、省城图1幅、府地理图8幅、州地理图4幅、卫地理图14幅、所城图2幅
3	万历《贵州通志》	全省舆图1幅、省城图1幅、宣慰司贵阳府贵前二卫图2幅、卫图11幅、平越府卫城图1幅、州卫图4幅、所图2幅、府图3幅、府城图3幅、都匀城图1幅
3	万历《黔记》	省地理图1幅、省城图1幅、府地理图8幅、府城图6幅、州地理图5幅、州城图5幅、县地理图8幅、县城图8幅、卫地理图20幅、卫城图18幅、所地理图4幅、所城图8幅
4	嘉靖《思南府志》	府儒学图1幅、府境图1幅、府公署图1幅、县城图2幅、司公署图4幅
5	万历《铜仁府志》	府舆地图1幅、县舆地图1幅、司舆地图5幅

## （二）贵州清代的部分省志府志舆图

清代，尤其是清中后期，朝廷倡导编纂地方志，贵州产生不少地方志书，舆图范围更为扩大（见表2）。省志如康熙《贵州通志》（后志）、乾隆《贵州通志》；府志如康熙《思州府志》、乾隆《南笼府志》、乾隆《镇远府志》、道光《遵义府志》、道光《铜仁府志》、道光《思南府志续志》、光绪《黎平府志》等。由表2可知，表中列出的两部省志均有全省总图和府图，康熙《贵州通志》（后志）还有省会图和民族风情习俗图。表中出所选的7部府志舆图多寡不一，康熙《思州府志》仅有郡图1幅；乾隆《南笼府志》除有府亲辖图和府公署图外，还有府州县并驿道全图和统辖水道全图；乾隆《镇远府志》有府全图和府分图、厅图、县图和分县图、县卫城图；道光《遵义府志》有府境图和府城图、县境图；道光《铜仁府志》有府全图和府城图、县图、司图、正大营图；道光《思南府志续志》有府全图、府治图、府公署图、府八景图、府庙宇图、县治图、县公署图、县庙宇图；光绪《黎平府志》有府境图、府公署图、府学宫图、府考棚图、府书院图、府十景图、厅境图、县境图、县署图、府县分治图、府县同城图。

<sup>①</sup> 张英聘：《明代贵州省志舆图编绘与特点》，《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1期。

表2 贵州清代部分省志府志舆图表

序号	书名	舆图类型及幅数
1	康熙《贵州通志》	省总图1幅、省会图1幅、府图11幅，另有民族风情习俗图30幅
2	乾隆《贵州通志》	省全图1幅、府图13幅
3	康熙《思州府志》	郡图1幅
4	乾隆《南笼府志》	府州县并驿道全图1幅、统辖水道全图1幅、府亲辖图1幅、府公署图1幅
5	乾隆《镇远府志》	府全图1幅、府分图1幅、厅图2幅、县图2幅、分县图3幅、县卫城图1幅
6	道光《遵义府志》	府境图1幅、府城图2幅、县境图5幅
7	道光《铜仁府志》	府全图1幅、府城图1幅、县图1幅、司图2幅、正大营图1幅
8	道光《思南府续志》	府全图1幅、府治图1幅、府公署图1幅、府景图8幅、府庙宇图3幅、县治图2幅、县公署图3幅、县庙宇图6幅
9	光绪《黎平府志》	府境图1幅、府公署图1幅、府学宫图1幅、府考棚图1幅、府书院图1幅、府景图10幅、厅境图2幅、县境图2幅、县署图1幅、府县分治图1幅、府县同城图1幅

### (三) 贵州明清省志府志舆图发展趋向

上文选取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贵州部分省志府志舆图列于表中以便对比分析，从两表对比看，明清两代舆图类型大体相近，仅有略微不同。明代选4部省志，清代选2部省志，它们之间均以疆里图为绘制的主要对象，涉及全省总图、省城图、各府州县卫所图，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民族地区还增加土司辖境图，如嘉靖《思南府志》、道光《铜仁府志》等；不仅只限于疆里图和城图的绘制，还增加公署图、儒学图、境图等，如嘉靖《思南府志》。这种发展趋势到清代得到进一步凸显，康熙《贵州通志》（后志）增加各民族风情习俗图30幅，用以展示贵州民族地区的人文风物。自清乾隆年以后，举凡天文、舆地、江海、河道、名胜、寺庙、风水等相关内容均可入图，受此风影响，地方志舆图趋于繁富。如乾隆《南笼府志》增加驿道全图、水道全图；道光《思南府续志》增加庙宇图和景图。明清两代贵州地方志舆图，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内容充实，范围扩大，增加舆图的类型，如光绪《黎平府志》除继承传统疆里图、城图、境图之外，还增绘公署图、学宫图、考棚图、书院图、景图等，扩大了舆图的功能；二是有的志书的舆图则朝精简方向发展，提高各幅舆图内容的细致性和准确性，体现舆图绘制上的进步，如万历《铜仁府志》仅绘制疆里图，又如道光《遵义府志》仅绘有府境图、府城图、县境图等。三是城图和公署等图出现，反映出绘图者对城市建设与布局规划的重视。如康熙《贵州通志》（后志）的省会图，乾隆《南笼府

志》的府公署图等。四是民族风土风俗图、土司辖境图的增加，说明少数民族生活与族群存在已纳入志书编纂者的视域，并成为志书编纂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嘉靖《思南府志》、万历《铜仁府志》分别有土司公署图4幅、土司舆地图5幅，康熙《贵州通志》（后志）有各地少数民族风情习俗图30幅。

#### （四）贵州明清舆图绘制对邹汉勋的启示

以上贵州地方志舆图绘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不仅被邹汉勋继承发展，而且贵州明清地方志舆图发展的趋势在邹汉勋参编或纂修的府志中也得到进一步展现。在湖南时，邹汉卿曾作为同纂协助邓显鹤编《宝庆府志》，这是他参编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该书共8册，计146卷。在《宝庆疆里图说》中，邹汉勋根据用经纬测绘地图的理论方法提出了舆图编制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明分率（即比例）、分准望（即标准）、定中宫（即坐标）、测日量（即以经纬度划为方格，每方格按比例表示里程），并对前代舆图所用标识符号加以沿用或改进完善，如山用“叠人”、水用“双线”、路用“叠点”等。这些原则与方法的实践，为他到贵州参编或纂修4部著名府志奠定了基础；加之对贵州明清两代地方志书的关注与借鉴，使其从中吸取各部地方志书的长处，因而他的舆地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具体运用和提升。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均沿用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和“计里画方”之法以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四至八到”之法，将之与《宝庆府志》采用的绘图原则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邹汉勋舆地学对前代的承继情况。从《宝庆府志》到《兴义府志》的舆图绘制，还可以进一步考察邹汉勋在舆地学方面继承→发展→创新的历程；从邹氏删正的《贵阳府志》和纂修的《大定府志》《安顺府志》以及协修的《兴义府志》所绘制的舆图，均能看到贵州地方志舆图对他所产生的启示作用。《安顺府志》的删繁就简，就是他看到贵州地方志舆图类型繁芜博杂，而从中吸取经验，并结合西方地图绘制知识而产生的地方志经典之作，故《兴义府志》再振其余续，承继其脉系而弘扬光大。

## 二 邹汉勋参编或纂修4部名志疆里舆图图说

道光二十五年（1845），时为郡廪生的邹汉勋作为同纂参与黄宅中、邓显鹤编修《宝庆府志》之后，便应贵州巡抚贺长龄邀请到贵州游历，并被贵阳知府周作楫聘请帮助删正《贵阳府志》。道光二十七年《贵阳府志》修成，邹汉勋受大定知府黄宅中相邀前往总纂《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大定府志》结稿即赴安顺总修《安顺府志》，其间又协修《兴义府志》。邹汉勋为著名的舆地学专家，故他参编或纂修的4部名志的舆图也能反映他的舆地学成就。

#### （一）《贵阳府志》疆里图说

邹汉勋到贵州不久即参与删正《贵阳府志》，该志39册，共88卷，其卷24《疆里图记第一之一》对编绘《贵阳府志》舆图的原则进行了说明：“方志古曰图经，重图也。图而系之以经，图必有记，次相辅也。图难矣，而图黔南尤难。图者，苟知裴氏之六法，思过半矣。图黔南者，虽知裴氏之六法，尚不能成，何则？”<sup>①</sup>开宗明义指出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体”原则，即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方邪、迂直<sup>②</sup>等不能完全解决贵州舆图绘制中的实际问题，因贵州多深溪、多伏流、土地多华离、民族错杂、道路丛箐多而远近不定、山脉峰丛嶂杂、居民鲜少等诸多原因，故难绘舆图，不能全按裴秀之六法制图。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道光《贵阳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6页。

<sup>②</sup> 参见《晋书》卷36《裴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040页。

邹氏于是提出：“今据其可信者，以审其可疑；据其所有者，以推其所无。纳之于轨，而分其大定之以方，而略其小，乖刺者缺焉，阔落者缺焉。一其分率，明其界画，使有志者可因而加密焉，可就而更正焉。其间为总图者，括其全也；为分图者，定其界也。全图而析之者，明合者之可分，而亦使分者之可合也。第轮以甲乙，中于府治，而东西南北定其方隅分一，州县纲之，而司里领之，图具而记丽焉。”<sup>①</sup> 邹氏阐述绘制《贵阳府志》舆图的方法，主张根据前人绘制之图作为参照，辨识疑处，进行推证而确定有无，将乖刺、阔落的存疑留缺，统一分率和界画，明确总图与分图之间的功能及作用，确定疆域四界。如此细化各幅舆图的职能，使所辖各处疆域界限更为明晰。

### （二）《大定府志》疆里图说

《大定府志》刊印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共60卷，分为冠篇、内篇、外篇3个部分，共有舆图7幅，采用古代分率法，“各依纸量地为方格”<sup>②</sup>，用虚线表示纬度（极高）与经度（偏西）的度和分。“明末清初西方制图学传入中国以后，少数志书地图也有加绘经线和标示纬度的”<sup>③</sup>，《大定府志》在绘图中也注意到经纬度的配合使用。此外，还将城、里、塘汛用不同符号标识，即“正方者为府城，长方者为州城，椭圆者为县城，长方而剗角者为厅城，平圆而隅分者为诸里，小圈为塘汛”。至于路、山、水等亦用标识符号标于舆图：“连点为道路，连人为山，双线为水。”还将水的流向用线条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水源线合，水尾线开，伏见开而连，入境出境开而不连，界则为单线。”<sup>④</sup> 此外，列出参照的舆图名称，有《皇清一统舆图》《贵州府厅州山河道里图》《贵州通志图》《大定旧志图》《大定志稿略图》《平远州志图》《黔西州志图》《威宁州志稿图》《毕节县志图》《大定档案图》《大定六里义仓图》，共11幅。

### （三）《安顺府志》疆里图说

《安顺府志》成书于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于咸丰元年（1851），共16册，54卷（另有卷首1卷）。该书专列《安顺府舆图则例》说明绘制舆图主要仿照《遵义府志》加以方格，并套以红印板，使界限眉目清楚。为突出官地，对“城池、塘、汛、铺等字”，特用红字加以区别，“城用黑口圈，塘用小红○圈，汛用小红瓜△圈，铺用小红□圈”，作为标识。对各地疆界则采用红单线标识，各地疆界中杂入其他地方疆土的，则“择其要地一二处以黑印阴文别之”。其余水、桥、渡、海子、大潭、山等均用符号标识于舆图：“绿双线为水，水源线合，水止而伏，或入洞则线头用，一水行出界则线口用。分通衢之桥以红=字跨之，渡以红斜\字穿之，海子、大潭则用绿圈，山用▲，出界大山则用连丛，路则于各图中仅以黑点计。”里程则“大道如正方十里，斜角十三里，余此鸟道，直路也。人行路则有纡曲，计图缩而计里盈”。目的是通过所绘舆图让人们得以了解“山川之阻深”<sup>⑤</sup>。

### （四）《兴义府志》疆里图说

《兴义府志》共74卷（另有卷首1卷），张锳纂修，邹汉勋与朱逢甲为协修，卷首有《舆图总说》阐述古地图之源流，说明依裴秀“制图六体”的作图之法，兼师法李吉甫“四至八到”

<sup>①</sup>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道光《贵阳府志》，第566页。

<sup>②</sup>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道光《大定府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207页。

<sup>③</sup> 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

<sup>④</sup> 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道光《大定府志》，第207页。

<sup>⑤</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6页。

之说，即用古地理之学中的东南西北四正（至圣）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来表示州县的方位距离，认为清代胡渭《禹贡图》、李兆洛《皇朝一统图》“尤精密可师”，借鉴古人地图“多以五色区别”之法，仿照近人王秦恭《阅史书约》之法：“地理十六图，更于今地名用朱书，而以墨书古地名于其上”，对通志、旧志舆图，“用墨绘墨书，复考证其与今不合者，以朱绘朱书。”对所别绘考证的新图：“则用五色，以区别各界。”这一方法，贾耽在《海内华夷图》中已提出，在舆图绘制上采用了“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的“古墨今朱”的双色绘制法。鉴于古地图“计里画方”之法对黔地不适用，而因地制宜，另行绘图：“随其高下迂直方邪，注明道里，庶得其实。”<sup>①</sup>

以上4部府志舆图总图说内容的变化反映出邹汉勋舆地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对于《贵阳府志》，邹汉勋的工作主要是删正，严格地说其并未直接参与编写，故舆图绘制以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原则为法式，就连标识符号也来自古地图，值得注意的是该志采取存疑留缺的措施，对有问题之处存疑。这部府志的舆图绘制原则主要是承袭古地图理论，体现《大明一统志》经纬测量的舆图方法。至于《大定府志》，邹汉勋身任总纂，是整本志书的直接负责人，舆图处理有许多变化：一是选图精审，避免杂芜冗繁；二是舆图绘制，继承古图分率法，注意纬度与经度的度分，已具有近代地图理念。《安顺府志》最能反映邹汉勋对古代舆地学方法和西方地图理论的结合创新，不仅用《舆图则例》明确绘制舆图的原则，而且采用黑红绿三色绘图，显得更为醒目，易于区别识图；在所绘制的舆图上标明里程比例，依图即能计算各地路程及区域面积，并创造一些新符号来作为图上标识，使各类型图物易于辨别。作为协修，《兴义府志》继承和发扬《安顺府志》舆图绘制的长处，既采用古地图“制图六体”原则和“四至八到”之法，并用五色绘制新图，旧图则将古今不合处用朱色标出。将这些出自邹汉勋参编或纂修的府志中的舆地学作法综合起来，即可形成一套舆图绘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三 4部名志在舆图绘制上的继承与创新

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评价104种地方志书，称这些“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志书，为“可称者”<sup>②</sup>。邹汉勋在贵州参编或纂修的4部府志均名列其中。这一评价，肯定了这4部志书的成就和地位，说明这4部志书具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舆图反映出一个著名舆地学家的识见和建树（见表3）。

表3 邹汉勋参编或纂修的4部府志舆图表

序号	书名	舆图类型及数量
1	道光《贵阳府志》	府总图1幅、府亲辖图1幅、贵阳全图（共19幅分图）、贵阳内城图1幅、贵阳外城图1幅、厅图1幅、州图5幅、县图4幅；另有诸山图1幅、江河图9幅、万寿宫图1幅、府文庙图1幅、县文庙图1幅、文昌宫图1幅、关路津梁图1幅、古城地图11幅

① 参见安龙县史志办公室校注：咸丰《兴义府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续表)

序号	书名	舆图类型及数量
2	道光《大定府志》	府全图1幅、府亲辖图1幅、厅图1幅、州图3幅、县图1幅
3	咸丰《安顺府志》	大清会典府图1幅、贵州通志府图1幅、府总辖舆图1幅、府合郡山水全图1幅、府亲辖舆图1幅、厅图2幅、州图2幅、县图3幅
4	咸丰《兴义府志》	图贵州通志府图1幅、旧志府图1幅、皇舆府图1幅、考正府图1幅、旧志府亲辖图1幅、考正府亲辖图1幅、旧志府水道图1幅、考正府水道图1幅、旧志府城图1幅、考正府城图1幅、府公署图1幅、府总兵署图1幅、府试院图1幅、府文庙图1幅、州考正图2幅、州城图2幅、县旧志图1幅、县考正图3幅、县城图3幅、捧鲊巡检城图1幅

### (一) 各书舆图的名目及分布

在这4部方志，舆图情况各有不同。道光《贵阳府志》舆图最多，有60幅；道光《兴义府志》次之，有26幅；咸丰《安顺府志》再次之，有12幅；咸丰《大定府志》为数最少，仅7幅。

道光《贵阳府志》的卷24为《疆里图记》，卷30为《山水图记》，卷34为《城郭图记》，卷35为《宫室图记》，卷37为《关路津梁图记》，卷38为《古城地图记》。有图有记，“记”类似古地图的“经”，即后来的“图说”，在该书中实为各卷图说。该志图包括府总图、府亲辖图、所辖各县州厅图、贵阳全图、诸山图、乌江图（上下）、南明河图、滴登河图、瓮城河图（上下）、南盘江图、濛江图（上下）、贵阳内城总图、贵阳外城总图、万寿宫图、府文庙图、县文庙图、文昌宫图、关路津梁图、汉故且兰县图、晋万寿且兰平渠县图、晋晋乐且兰二县图、隋牂牁郡图、唐矩蛮勋功庄明刻乡清今十州暨罗甸国图、宋矩蛮勋功庄刻乡清今南宁十州暨罗甸国图、南宋西南诸番图、元诸土司图（上下）、明贵阳府图（上下）等，十分详细，颇显繁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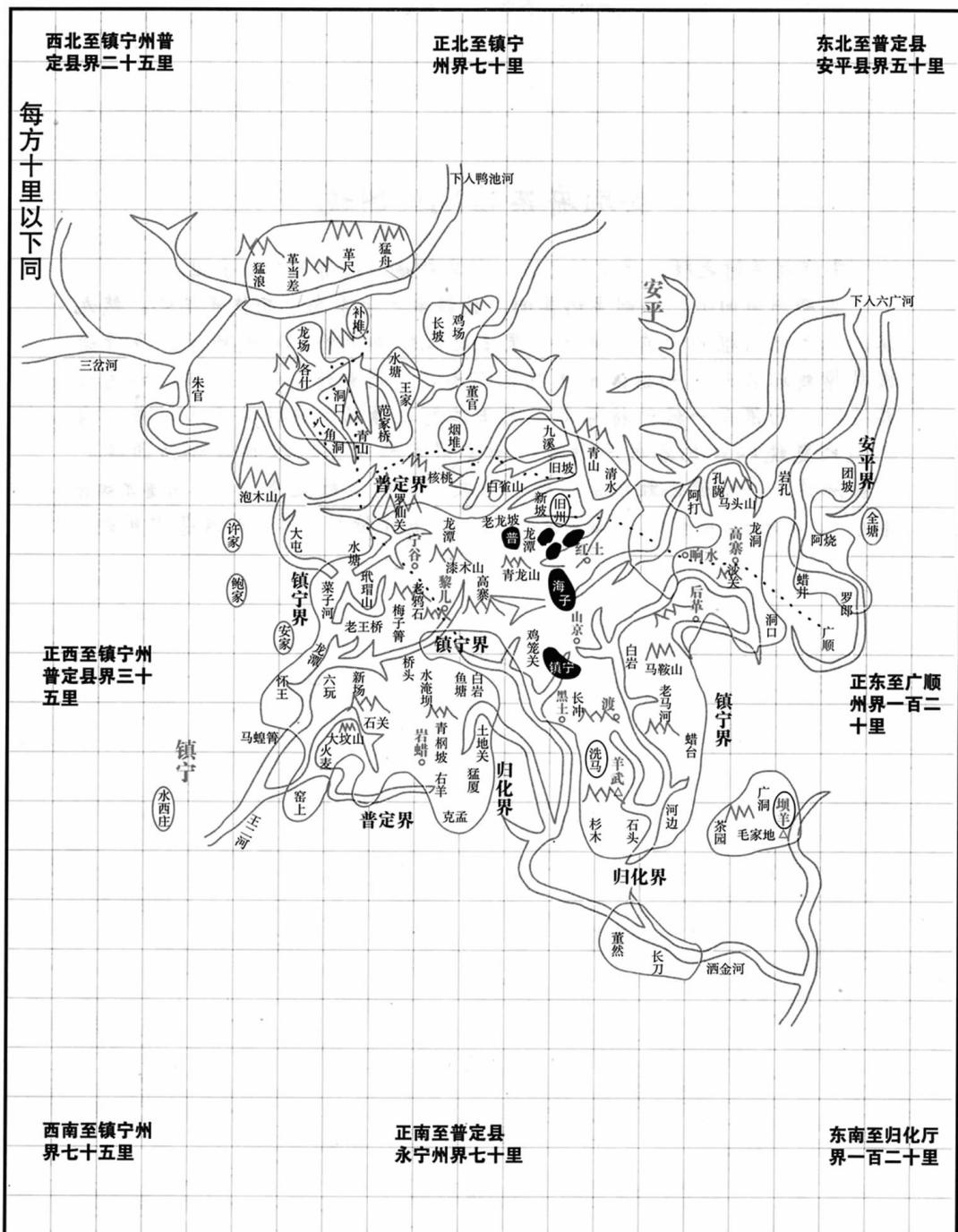
道光《大定府志》舆图有大定府属全图、大定府亲辖地图、水城厅地图、平远州地图、黔西州地图、威宁州地图、毕节县地图，均在卷11。

咸丰《安顺府志》是邹汉勋舆图创新的代表之作，取用旧图2幅，即《大清会典安顺府舆图》《贵州通志安顺府舆图》；其余10幅为新图，用黑、红、绿三色绘制（图例见下），包括安顺府总辖舆图、安顺合郡山水全图、安顺府亲辖舆图、郎岱厅舆图、归化厅舆图、镇宁州舆图、永宁州舆图、普定县舆图、安平县舆图、清镇县舆图，编于卷2。<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11、13页。

咸丰《兴义府志》舆图在卷首，包括旧图与新图，有贵州通志南笼府图、旧志南笼厅图、皇舆图南笼府图、会典兴义府图、考正兴义府图、旧志府亲辖图、考正府亲辖图、考正兴义县图、考正普安县图、安南县志安南县图、考正安南县图、考正贞丰州图、考正册亨图、旧志南笼府水道图、考正兴义府水道图、旧志南笼府城图、考正兴义府城图、兴义县城图、普安县城图、

## 安顺府亲辖舆图



安南县城图、贞丰州城图、册亨州同城图、捧鲊巡检城图、文庙图、兴义府署图、总兵署图、试院图等，其中旧图为墨绘墨书（考证古今不同者用朱书），新图为五色图。

# 安顺府合郡山水全图



## (二) 对4部府志舆图绘制的分析

舆图在府志中的分布情况与各志书的编纂体例相关，《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尊王朝重祀典，故疆里置于后；《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以疆里为冠，统领志书，故疆里舆图位于志书卷2或卷首。舆图种类的多寡则与编志者的绘图原则和辖境内容相关，贵阳为省会，且辖境涉及范围广而人文彰显，加上编纂者务求详备，故舆图种类甚多。兴义因清嘉庆年改名和历史上设置不同之故，收入以前各舆图和绘制新图，故舆图比安顺、大定多。安顺和大定一是取用的旧图少，二是绘图仅限于疆里图，尤为注重体现近代地图的功能作用。从继承发展的角度说，《贵阳府志》更注重对古地图绘制的承传，舆图多受明《黔记》，清康熙和乾隆《贵州通志》之影响；《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主要沿袭明清志书中崇尚简明之法和重在对西方地图观念的接受，因而展示了邹汉勋舆图绘制的创新性和发展理念。

## (三) 邹汉勋舆图绘制成就

通过对邹汉勋参编或纂修的府志中舆图总图说的分析，可以看到邹氏绘制舆图有一个不断改进并趋于精审的过程。一是对传统舆地学理论继承并灵活运用。从《宝庆府志》到《兴义府志》，邹氏始终将古地图中“制图六体”原则作为绘制舆图总纲领，先确定各地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及其经纬，明确各幅舆图的大致格局，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域采用相应标识符号来说明特殊情况。二是对古地图绘制的成功经验加以取舍吸收，如《大定府志》仅有7幅舆图却参考相关11幅舆图，《安顺府志》沿用《大清会典》舆图和《贵州通志》舆图各1幅，《兴义府志》在沿用《贵州通志》、兴义旧志舆图基础上，对原图考证古今不相符之处用朱书加以标识。三是标明“四至八到”，明确经纬度，使边界清楚易于辨识，如4部府志均对四正方、四隅方标明起止里程，《安顺府志》和《兴义府志》在绘图上还明确标出经纬度，更是其舆图的又一成就。四是根据贵州的地形地貌特征，不使用传统“计里画方”法，如《安顺府志》对大道“正方”“斜角”的区分，人行路“纡曲”以及《兴义府志》随地形高低直曲来测量里程，在舆地学上均有创新，是经纬测量与三角测量的具体实践。五是在采用传统符号标识舆图的同时，创造出一些新标识符号，如《大定府志》的城、里、塘汛、路、山、水等均沿用古图的标识符号，《安顺府志》创新性地将塘、汛用不同符号标识，增加铺的标识符号，将表示水的双线改用绿色，创造不同符号表示桥（双杠）、渡（红斜杠）、海子和大潭（绿圆圈）等。

## (四) 邹汉勋对西方绘图理念的吸收

明万历年间，西方制图技术通过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已传入中国，清康熙、乾隆时期，有关西学的地理知识亦通过传教士不断传入中国，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传教士奉皇命以实测数据为基础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采用西学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法，提高了图的准确性。道光至同治年间主要是根据《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绘制地图，是将传统的“计里画方”方格网与桑逊投影中西结合的方法来绘制舆图。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舆地学的开创者邹汉勋在接受地理新学上自然比别的学者容易，他总修的《安顺府志》在舆图绘制上就受此影响。一是对《安顺府志》舆图绘制进行实地勘测考察，据《安顺府舆图则例》，参编者吴寅邦和刘起春奉命到安顺府下属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测量并绘制草图：“寅邦十余日而还，起春则山岭、水溪、苗寨、倮村露宿草行者四十八日，安顺、普定之足迹所不到者，鲜矣！乃敢厘定成图，而于外属州县亦分而图之。先绘总舆图一张，复绘山水总图一张，庶分

疆画里，寻流溯源，可一览而备矣。”<sup>①</sup> 虽然这种实地考察测绘还比较简单，也不是由专业人员测绘完成，但已经包含近代西方勘测绘图的理念在内。二是所绘新图均用符号表示，如“城用黑□圈，塘用小红○圈，汛用小红瓜△圈，铺用小红□圈”<sup>②</sup>，没有采用图画形式去依实物画制。正如王慧所言，符号化“表明方志地图已经完成由古代山水画型向科学测绘地图转型”<sup>③</sup>。三是采用比例尺和方位标绘制新图，便于通过舆图计算里程、面积和确定方位。新图均以红方格为图底，图上标明比例，如《安顺府总辖舆图》的图上标有“每方二十里，山水图同”，《安顺府合郡山水全图》的比例同此，《安顺府亲辖舆图》图上标有“每方十里，以下同”，安顺府所辖二厅、二州、三县舆图比例同此；每幅新图均标出四正方和四隅方的至向里程，从而使方位明确；对于道路则说明：“大道如正方十里，斜角十三里”<sup>④</sup>，按此比例亦可算出路程。于此将传统的“计里画方”结合实测经纬法，提高了里程方位的精确度，突出了舆图的实用性。如此绘图能“将绘制者的地理认知传达给了使用者，同时体现着方志地图近代科学化的发展与近代社会转型、社会需求的内在联系”<sup>⑤</sup>。总之，“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化历程，对中国地方志地图的发展演变影响很大，从制图质量到地理观念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提高了方志地图的重要性，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图地相合”<sup>⑥</sup>。邹汉勋的《安顺府志》所绘新图就是这一实践的产物。

#### （四）《安顺府志》与《兴义府志》舆图比较

在舆图绘制上，《安顺府志》与《兴义府志》的绘制原则和理念，脉系相承，一定程度反映了邹汉勋舆地学的发展变化路径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一是这两部府志的舆图，不仅收入了旧图，更为重要的是绘制了新图，并且各幅舆图都配有图说，对该幅舆图加以说明，具有画龙点睛的提示作用，保留着《元和郡县图志》一图一说的古制。该书言：“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sup>⑦</sup> 这一特点《贵阳府志》（当中的图说是针对一类图，而非一幅图）和《大定府志》均未采用。二是两部府志的新图均采用彩色绘图，《安顺府志》的新图为三色图，《兴义府志》则增为五色，凸显视觉效果，不仅便于识图，更能显示图的层次，使舆图更加形象化，展现出邹汉勋舆图绘制的创新性。三是均能注意贵州山川阻深的特点，“计图缩而计里盈”<sup>⑧</sup>，“随其高下迂直方邪”<sup>⑨</sup>，在舆图上较为准确地表现出疆域的里程，便于据图计算。四是图说能紧扣各幅舆图的内容而用精练准确的文辞揭示展现，具有高度概括性，通过各幅图说可以了解疆域的大致面貌和风土人情。如《郎岱厅舆图说》：“郎岱所辖地，东西南三面皆狭，而广袤者在正北、西北、东北之地。打铁关雄峙西南，丸泥可封；巴笼屯奥藏东北，烽烟永净。西林渡远，驿路直接滇云；南极山高，沃野平连陇水。峰之绵亘者，无如那邦；河之襟带者，乃有暮作。羊场司为分治，两路口为极边。落别一带，又所属繁盛之区

<sup>①</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18页。

<sup>②</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18页。

<sup>③</sup> 王慧：《从画到图：方志地图的近代化》，《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1期。

<sup>④</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18页。

<sup>⑤</sup> 王慧：《从画到图：方志地图的近代化》，《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1期。

<sup>⑥</sup> 刘增强：《近代化进程中云南地理志舆图演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sup>⑦</sup> 李吉甫纂，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sup>⑧</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6页。

<sup>⑨</sup> 安龙县史志办公室校注：咸丰《兴义府志》，第21页。

也。国朝建设厅治，不特为郡西之保障，其田野之沃腴，山川之雄特，亦诚足为郡之亚欤！”<sup>①</sup>又如《考正兴义府城图说》：“此图就今之城与地绘之。今右营都司署已移建于东门内，书院已移建于试院侧；半山亭则新建，招堤之侧，平波数里，皆种莲，夏日花开，为郡景第一。北门坡在西门内，而坡名北门者，昔时在旧城之北门也。”<sup>②</sup>前者文辞生动形象，骈文味足；后者文辞平实，古文味醇。前者注意四至方位里程，疆界划然；后者突出名胜，风景婉致。此外，《兴义府志》有的图说甚为简略，且多用按语形式。五是《兴义府志》取用旧图较多，每一幅旧图后又有考正的新图，且每幅图上又多有说明语，图面显得局狭凌乱。这是《安顺府志》之所无。《安顺府志》无城图与公署庙宇等图，《兴义府志》有城图、公署图、总兵署图、试院图、文庙图。如此而论，两部府志舆图均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邹汉勋的舆地学原则和卓越的识见力。

## 结语

舆图作为地方志书的重要部分之一，同样担负着资治、存史、教化功能，是我国方志文化成果的结晶。舆图形成发展源远流长，综合而言，经历原始地图、传统地图、实测地图3个历史阶段。贵州明清两代舆图反映了后两个阶段的绘制情况。明代主要仿照《大明一统志》进行舆图绘制，以裴秀“制图六体”“计里画方”，李吉甫“四至八到”之法为原则，并以明嘉靖时期罗洪先的《广舆图》作为参考。直到康熙时期贵州地方志多采用此法。乾隆时期至晚清，贵州地方志在继承传统之法的同时逐渐兼行实测之法，加入带有实测绘制特点的新图，邹汉勋参编或纂修的4部府志就体现了这一转化的过程。尤其是咸丰《安顺府志》咸丰《兴义府志》不仅用彩色绘制新图，而且还创制一些标识符号用以表示舆图上的不同内容，与近代地图更为接近。从这个意义说，邹汉勋在府志舆图绘制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为地方志书舆图绘制做出了示范，展现出他的舆地学新理念，奠定了他在舆地学领域的地位。《清史稿》称邹汉勋：“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同县邓显鹤深异之，与修《宝庆府志》。又至黔中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sup>③</sup>又誉之曰：“时以江、戴目之。”<sup>④</sup>这足以肯定邹汉勋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sup>①</sup> 参见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咸丰《安顺府志》，第18页。

<sup>②</sup> 安龙县史志办公室校注：咸丰《兴义府志》，第70页。

<sup>③</sup> 《清史稿》卷482《儒林三》，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289页。

<sup>④</sup> 《清史稿》卷482《儒林三》，第13289页。